

「臺灣人」身分認同的劃界與日常實作： 評藍佩嘉的《成為「新二代」》

梁莉芳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成為「新二代」：多元文化與地緣政治下的跨國婚姻子女》，藍佩嘉著，春山出版，2025 年 9 月，352 頁。

臺灣的跨國婚姻移民現象開始於 1970 年代晚期與 1980 年代初期，來自於東南亞華人家庭的女性和臺灣本地男性的婚配，反映全球化脈絡下國家間的政治經濟權力關係與婚姻市場上性別、階級交織的階序。截至 2025 年年底，婚姻移民累計已達 615,355 人，其中，三分之二來自中國和港澳，以及三分之一為東南亞配偶，又以女性為主，約佔總人數的九成（內政部移民署 2026）。同時，婚姻移民子女（新二代）的推估人數超過 50 萬人，113 學年度在各級學校的在學者合計約 26.5 萬（教育部統計處 2025）。

隨著女性婚姻移民進入不同的生命歷程以及孕產生養，臺灣本土的研究也從對婚姻移民經驗的探究，擴及她們的子女，其中，以教育研究為最大宗，主要聚焦於適應、學業表現和學習成就，呼應政府政策對婚姻移民及其子女的治理邏輯——強調輔導、矯正和同化。即便在 2016 年推動新南向政策之後，主流論述的價值肯認仍立基於他們對於臺灣經貿發展與促進國際外交關係的可能貢獻。

挑戰支配觀點對婚姻移民子女的他者化，藍佩嘉的《成為「新二代」：多元文化與地緣政治下的跨國婚姻子女》一書，打破臺灣社會對於「新二代」的同質（甚至刻板）想像，藉由訪談 61 位母親來自

東南亞或中國的二代成年子女，以及其中 15 位移民母親，她試圖探問：臺灣的地緣政治位置、國際情勢，以及政府多元文化政策和論述的轉變，如何影響婚姻移民子女的生命經驗和身分認同？母親來自於不同國家（東南亞和中國）的二代子女，他們的經驗有哪些相似和差異？認同，不是固定的類別或不變的狀態，這些二代年輕人如何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不同的情境脈絡，發展出他們協商身分的多元策略和日常實作？

西方學界已累積一定數量的移民二代研究，但不論是相關理論或是經驗資料發現，皆不能直接應用於理解東亞的跨國婚姻子女，也無法涵蓋臺灣因殖民歷史、地緣政治與內部族群關係所形成的獨特性。藍佩嘉的研究與西方文獻對話，同時指出東亞的特殊性，再回到本土的脈絡，看見臺灣新二代。

誰是「新二代」？

在卷首說明，藍佩嘉爬梳臺灣政府與社會對於跨國婚姻子女的命名，及其社會學的意義。她指出本書的書名將「新二代」加上引號，「強調這是國家政策定義下的身分位置，新移民子女是否主觀認同此標籤，則關乎個人的生命歷程與行動選擇，而新移民子女之間是否能夠結盟、衍生集體認同，則有待未來發展。」（p.10）因此，儘管官方定義強調其父或母一方的公民身分，「新二代」的身分與認同不是被定義，而是「成為」的（現在）進行式。這亦是本書重要的分析觀點。

既有的新二代研究，多以母親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婚姻移民子女為主，中國籍的移民配偶和其子女因語言、文化親近性的預設，加上政治情勢的緊張，他們的移民身分往往被淡化為背景。隨著政府新南向政策的推動，臺灣東南亞新二代因其雙族裔的身分，被視為臺灣與東南亞國家重要的橋樑，相關的討論，經常忽略人數眾多的中國新二代。

藍佩嘉的研究納入臺灣中國新二代，不僅反映實際人口比例，更

考量地緣政治脈絡如何形塑母親來自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婚姻移民子女，經驗的相似與差異，以呈現「新二代」經驗的異質性與多樣性。她以「地緣政治汙名」和「多元文化紅利」兩個概念，指出臺灣與中國的政治對立、緊張以及政府的多元文化政策和論述，如何影響「臺灣中國新二代」與「臺灣東南亞新二代」這兩個群體的類別經驗，同時，她進一步闡述他們在日常中協商身分認同的個別策略（第四章和第六章）。

誰是「新二代」？「新二代」是國家治理、多元文化政策與地緣政治脈絡交互作用所建構的群體類別和社會位置，因此，認同不完全是個人選擇，涉及種族主義的權力不平等和階序關係。不過二代青年並非被動的承接身分標籤，他們動用資源、發展策略，（再）定義自我認同。族群身分不是理所當然的繼承資本，藍佩嘉採取界線（boundary）的概念，討論移民與公民身分的區隔和跨越，界線的鞏固和鬆動，以及闡述二代青年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持續透過身分管理、認同展現來協商界線。

鑲嵌於地緣政治與多元文化政策交界的個人身分認同

藍佩嘉的研究聚焦於 90 年代中後期到 2000 年左右出生的二代青年，同時期，臺灣社會正經歷解嚴後政治民主化、公民社會發展，以及臺灣認同與多元文化社會論述的形成。這群二代青年與他們母親的經驗，非常不同於早期的婚姻移民和其子女，民間團體的倡議行動以及政府政策治理的轉變，影響臺灣社會對於婚姻移民的理解、態度和對待——從將其視為國家人口素質與安全的威脅、鼓勵同化為適任的新移民母親、多元文化政策下搭橋穿界的媒介，到新南向政策肯認的族裔、語言與文化優勢。

討論身分認同管理策略時，藍佩嘉將「新二代」區分為臺灣東南亞二代、海歸或海航的臺灣東南亞二代，以及臺灣中國二代。她清楚地揭示，身分認同從來就不是個別的生命經驗，國家政策的治理邏輯在在體現於個人對「新二代」身分的無感、猶豫、抗拒、協商或擁

抱。同時，藉由對個人生命經驗的描繪，藍佩嘉呈現這群二代青年不是國家治理下的客體，他們敏銳地察覺身分汙名、調度資源、發揮創意，透過具身與情感勞動，在日常實作裡管理臺灣人和新二代的身分界線，甚而達到流動的效果，藍佩嘉稱之為「多元文化紅利」。

在本書的第四章，藍佩嘉將東南亞二代對新南向政策和雙文化身分認同的反應區分為連續性的光譜，兩端分別為「擁抱差異」和「認同多數」。臺灣越南二代詩佩，將自己在家庭環境中培養的語言和文化能力，轉化為大學申請、臺商工廠實習和職涯發展的機會，她以「一半臺灣人、一半越南人」描述自己的雙族裔、雙文化並存的身分認同。藍佩嘉筆下的另一位臺灣越南二代康永，從小心翼翼地與母親的越南身分抱持距離，到善用新二代的身分資格作為向上流動的裝備——移民署補助、特殊升學管道和社群媒體的個人品牌經營。藍佩嘉以「新自由主義多元文化」（neoliberal multiculturalism）描述詩佩或康永的日常身分認同實作，文化差異的肯認具有前提條件，在個人層次上是學業成績優秀，從國家的角度要能兌換為外交或是經濟價值。差異被編派為個人資本或是優勢，以個別肯認取代結構性的重分配，在政策的雷厲風行下，能善用制度管道獲得資源和機會，成為個人的責任。

第四章提到部分東南亞二代青年對新南向政策的抗拒和批評，長期以來臺灣社會對東南亞國家的汙名標籤，以及性別、族群、階級和移民身分交織的不平等，並不會因政策的推動，在一夕間產生翻天覆地的改變。像是臺灣越南二代彥霓和薇琪，成長過程中目睹母親在父系家庭內的邊緣處境，以及其原生國家文化遭受貶抑，她們批判政策立意和現實之間的落差，也對自己成為「新二代」的樣板感到不適。

藍佩嘉將上述近用政策管道取得的機會或資源，稱之為「多元文化紅利」，同時也談到政策產生的矛盾。例如臺灣越南二代的偉成和哲平，他們講述自己的族群身分被莫名其妙地組裝，被期待以特定的方式展演「又越又臺」的形象，或是訴說可憐、劣勢的生命故事。雖然藍佩嘉未特別強調這群東南亞二代青年，為符合政策期待的「新

二代」身分，投入的時間、心力以及身體和情感工作，在她描述的故事裡，我們看見這群二代青年為了成為「夠格」的新二代，種種的努力。例如，藉由學習越南文和拜訪母親原生國家人的楠子；或是主動報考學測證明自己學業能力的博超。用「紅利」來稱呼東南亞二代青年換取制度肯認而獲得的機會或資源，將其視為個人資本的增加，是不是有可能忽略他們在過程中的各種有形與無形的付出？特別是難以度量的情感工作。¹

相對於東南亞二代青年因新南向政策可能受惠的「多元文化紅利」，臺灣中國二代卻處於地緣政治的陰影，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對臺灣的武力威脅增加、政治關係緊張，夾在中間的二代青年，經常得在無預警的日常面臨國族認同、統獨議題等二元的表態或出櫃。中國婚姻移民子女的身分，往往無法轉換成有利的多元文化資本，反而成為汙名標籤。本書的第六章，藍佩嘉不僅闡述地緣政治汙名對臺灣中國二代的影響，也鮮活地呈現他們如何運用創意進行日常的身分認同管理和實作，例如：調整身分尺度。運用該策略的二代青年，降低尺度與母親的家鄉連結，區分與中國政府和中國整體的關係；或是提升尺度，強調世界主義與全球華人。我們看見這群二代青年不是被動地承受地緣政治脈絡與政府政策影響，而是作為積極的行動者，他們投入大量的身體與情感工作，矯正說話口音和用詞、因應汙名帶來的負面情緒（甚至自我否定），以及處於中國和臺灣之間的矛盾心情。他們得一直向自己、同儕和更大的臺灣社會證明——自己是臺灣人。

族群、階級、性別與遷移身分的交互作用

本書第四章的開頭，藍佩嘉引用臺灣越南二代哲平的訪談，形容新南向政策是「岸上的燈塔」，隨著多元文化浪潮，可能把握機會上岸，或是持續在黑夜的大海裡，載浮載沉。參與研究的受訪者，

1 對「紅利」一詞的反思，受惠於東華大學校內「東南亞與跨國遷移社群」讀書會，多位新二代學生分享他們的生命經驗以及對「紅利」的看法。

主要來自於勞工階級家庭，僅有少數是「已經在岸上」的中產階級，反映多數的婚姻移民家庭組成，受到全球化與婚姻市場性別邏輯的影響——因階級身分失利的臺灣男性，藉由與來自東南亞或中國的女性結婚，回應傳統性別觀念的期待。

書中所描繪的二代青年，他們的生命經驗呈現族群、階級、性別與遷移身分交織的不平等，難以將權力運作視為線性累加或是彼此獨立，而是鑲嵌於臺灣的地緣政治脈絡與多元文化政策治理，交互作用形塑其身分認同管理與實作。藍佩嘉為呈現二代青年生命經驗的交織性與異質性，研究設計上，不僅同時納入臺灣東南亞二代與中國二代，每一類別下，她嘗試極大化研究參與對象的差異性，包括：家長的階級背景與婚姻關係、教育程度與就讀學校和科系、海歸與海航的經驗等。不過，誠如藍佩嘉在本書的結論提及，該研究的參與對象較難接觸到教育程度比較低的新二代，這群二代青年多採取「認同多數」的身分管理策略，進一步閱讀書中引用的訪談逐字稿，可以發現，他們對於認同、歧視和汙名等學術語彙十分陌生，更遑論用以描述自身的生命經驗，新南向政策的燈塔探照，距離他們每日的生活現實太過遙遠。這群特定二代青年的經驗，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拿掉學術術語後，該如何理解與書寫他們的生命？同時，他們對新南向與多元文化政策的疏離感，協助我們反思政策對於資源分配與重分配的效果，以及和個人日常現實之間的斷裂。

研究臺灣的婚姻移民，無法避免探究性別權力關係的作用，及其與族群、階級和遷移身分的交織。那二代青年的研究呢？藍佩嘉的書裡描述了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對家庭內權力關係的洞察以及遭受的影響，身為長子女的受訪者，特別容易對母親的經驗產生共感，進而形塑其雙族裔的身分認同。不過，書中較少直接討論，生活在父系與父權支配的臺灣社會，性別關係如何影響二代青年的認同經驗、策略與實作。既有的研究指出，移民家庭經常看待族群界線的維持是女兒的責任，造成二代女性面臨守護文化與融入主流的矛盾（Espiritu 2001），臺灣二代青年是否經驗相似（或相異）的性別作用？有待後

續的研究回答。

誰是「臺灣人」的探問？

從《跨國灰姑娘》、《拚教養》到《成為「新二代」》，藍佩嘉的三本書看似處理不連貫的題材，其核心關懷皆與「界線」相關。她探究處於不同社會位置、生命經驗差異的個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劃界工作，區隔「我們」和「他們」的界線，以及鬆動、滲透、跨越和再製界線，並反映個人與更大尺度的權力關係不平等——全球化和地緣政治，以及性別、族群、階級和遷移身分的交織。《成為「新二代」》一書，藉由探究國家對於婚姻移民子女的治理，如何形塑其日常的身分認同管理和實作，他們又如何在此結構的限制下成為積極的行動者，藍佩嘉將對界線的探究轉為對誰是「臺灣人」的探問，誰能成為臺灣共同體的一員。

楊双子以《臺灣漫遊錄》獲得國際布克獎時，她在得獎感言裡指出，臺灣文學百年來始終環繞著相同的提問：臺灣人想要什麼樣的未來？臺灣人想要什麼樣的國家？也在追尋「我們想當什麼樣的人」的過程中，探問誰是臺灣人。在漢人大量移入之前，臺灣是南島語系民族重要的發源地之一，歷經不同殖民政權、國族建構及民主化的過程，「臺灣人」始終是一持續協商中的政治、文化與情感類別，透過探究婚姻移民子女的身分認同管理，藍佩嘉邀請我們一起思考：誰是「臺灣人」？政權更迭如何影響族群界線（再）重劃以及身分認同實踐，個人不只是被動回應政策治理的標準，更是行動的主體。

「一個缺乏多元性的共同體，反而是沒有韌性的共同體。」² 藍佩嘉在研究新二代的過程中，看見新二代展現出的韌性和力量，也看見他們交織的身分認同，如何豐富臺灣社會的多元文化。誰是「臺灣人」？這不是靜止的提問，我們歷經不同的政權、族群邊界的改變，我們透過日常實作，「成為」臺灣人，也如《成為「新二代」》

2 本句引用自藍佩嘉於2026年5月19日在國立東華大學的演講。

一書的結語，「繼續擴展『臺灣人』的邊界認同與文化內涵」。(p. 321)

參考文獻

- 內政部移民署，2026，〈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統計（截至民國 114 年 12 月）〉。取自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5385/7344/7350/8887/>
- 教育部統計處，2025，〈各級學校新住民子女就學概況提要分析〉。取自 https://stats.moe.gov.tw/files/analysis/113_son_of_foreign_ana.pdf
- Espiritu, Yen Le. 2001. “‘We Don’t Sleep Around like White Girls Do’: Family, Culture, and Gender in Filipina American Live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6(2): 415-440.